

扶余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扶余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伪满洲国典章制度及部分回忆	吉占三 (1)
扶余县日伪统治机构及其罪恶活动	廖国文 (12)
关于日特外围组织——“扶余工作班”	廖国文 (16)
扶余名厨师和四大饭馆	高峻峰 (19)
扶余邮政简史	刘永富·孙希伟 (26)
六十年前扶余水陆交通概况	关士杰 (32)
万善石桥	孙希伟 (43)
小镇初绽革命文艺之花 ——记三岔河店员联合剧团	徐达音 (45)
我记忆中的扶余图书馆	张功颀 (53)
光复前后的扶余业余京剧团	徐达音 (55)
建国前后扶余的演剧活动	平献明 (59)
回忆《扶余县报》	吴占林 (65)
昔日扶余城区女子学校概况	邱景云 (68)
扶余民间传统体育游戏	戈立奇 (75)
扶余县第一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	戈立奇 (100)
中药店的幌儿	郭凤山 (105)
历史陋习	孙希伟 (108)
· 小资料 · 天气谚语	杨楷林 (115)
征稿启示	文史资料委员会 (117)

伪满洲国典章制度及部分回忆

吉 占 三

我于1988年11月10日返乡探亲，于11月27日回台，前后不足20天。在这次不足20天返乡探亲过程中，除与家乡亲友重聚外，并蒙扶余市各界热烈的欢迎和招待，使我在凛冽的寒风中，感到无限的温欣和高兴。在此，谨向诸亲友及各界人士，致以最高的敬意和感谢之忱。

此次返乡探亲中，除感受到家乡人给予我无限的温暖外，我最大的收获，当是我携回“扶余文史资料”共八辑。使我顿感又回到了童年一样，重温旧梦，儿时的种种，恍如昨日一般，历历入目，其中有些是伪满时代的旧事，更是感触良深。感慨之余，再加上手头恰巧有些资料，颇想一吐为快，前志之于后：

（一）伪满洲国初期的典章制度

自从“九·一八”日本发动侵略东北后，一夜之间整个东北即沦入日寇魔掌之中，而且处心积虑的制造了一个傀儡政权，将前清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到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帝国。

溥仪于民国21年3月7日，由旅顺赴沈阳。当时在沈南满车站迎接的人有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板垣、驹井等高级官员，另有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中国方面有新政权准备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臧式

毅、马占山、赵欣伯等。日满双方人员与溥仪在车厢会见，谈了一时，本庄等告退，由张景惠跟随溥仪到了长春。

当时的东北，最繁华的地方还是沈阳，长春虽然地理位置偏中，交通四通八达，但是尚未具备一个都市型态，房屋既没有余富，又不够现代化，一旦来了这么多大小官员，顿时显得拥挤不堪，当时溥仪被安置在大和旅馆，其他人只有各自找住处，自行解决居住问题。

伪满洲国新国都定在长春，改名为“新京”。何以舍沈阳而都长春？当时日本人另有一番深意，在关东军看来，沈阳在实际上已变成了第二“旅大”，不愿将伪满洲国国都渗杂其间，碍手碍脚，所以把它定在长春。日本侵略中国，有它的一套逻辑，就是分而治之，逐渐吞食。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建成的，大权全握在他们之手，但日本人还把它分成了南满、北满。南满由日本人直接统治，北满则由伪满洲国统治，实际上也是由日本人发号施令。

当时长春最大的官署，只有吉黑樵运局（道尹驻在官署），经过大典筹备处的人员商讨，决定把吉黑樵运局作为新政府办公处所。楼下作为客厅，楼上改为“执政”的办公室。这层楼后来改为“勤民楼”（笔者这次返乡途中，曾在长春做数日逗留，也曾与家兄共同游览了伪皇宫，还拍了许多照片，今附寄勤民楼照片等数张）。另外，又在吉黑樵运局的四周收购民地，建造官邸，这就是伪满洲国的皇宫。

伪满洲国建国方案是于冲汉起草的（关于冲汉其人本文后面将有详细介绍）。建国方案本身只着重在序言方面，序言仅宣传为什么要建立伪满洲国，至于怎样建立满洲国，却没有详细说明。满洲国的元首称执政，执政下面又设有国务总理。执政只是一个名义元首，和北洋政府段其瑞的执政又

有不同。一个国家在理应该有一个国会，伪满洲国却没有设立一个参议院，议长由执政指派，参议员不限定人数，到了后来简直没有，只有一个光杆议长。这还不算，无缘无故设立了一个立法院，名称当然是由中国国民党政府那边学来的。中国的立法院是议会，满洲国的立法院也说不上是搞什么名堂，说它是议会，却没有议员，要说是草拟法案的机构，地位就不该高到与国务总理平行。

立法院已经是够滑稽了，最妙的是还有一个监察院，这个名词无疑又是由中国国民党政府那边学来的。以上各机构，就是满洲国的行政、立法、监察部门。

（二）协和会之设立

在“扶余文史资料”第八辑中有孙祥先生撰写的“伪满扶余的协和会”一文，已大致说了一个梗概，本文在此用手头资料加以较详细的说明与补充。

1934年7月，满洲国协和会在新京正式成立。其来由是由于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国联调查团将来的“报告”，一定会对日本不利，恐怕东北人民会乘机“骚动”，就设法加强控制。对于满洲国各级政府加派日系官吏，渗透到每一个部门，任何政令都由日本人代办，绝不让中国人插手。基层方面，虽设立了协和会，希望利用这一组织，改造东北人民的思想，公务员一律改穿“协和服”，说“协和语”等等。

说到协和会，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它的前身可能是从朝鲜的“一进会”来的。当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势力已经渗透朝鲜，就由日本浪人与朝鲜奸合组一个民间团体叫做“一进会”。主持人有鲜奸李容九、宋秉峻及日本浪人黑龙会首脑武田范之、内田良平等人。其任务就是奴化朝鲜人，

宣传“日鲜一体”，到了日鲜合并，这个“一进会”的历史任务才算终了，自动解散。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对于义勇军有形的攻击，却没办法对付，而对于人民无形的反抗，却束手无策。最初，在关东军司令部第四科下面设立了一个“自治指导部”，指导部的本身既是宣传机构，同时也是计划机构。满洲国成立之后，计划机构结束，宣传机构仍然保存，但是也没能长期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第四科，于是就决定仿照朝鲜“一进会”的先例，组织了一个团体，作为对满洲人民宣传的机构。

提出这项“锦囊妙计”的是石原莞萧中佐，但是石原却定不出名称来，于是就请教于当时已经病危的于冲汉。于冲汉此人确是“天才”，略一沉思说道：“就叫做协和会如何？”石原莞萧笑道：“你定的名子自然不差，不过请你解释明白，将来别人问到，我才有法答复。”于冲汉腊黄的脸上泛出一丝笑容，说道：“意义包含的十分广，首先是满洲国的民族复杂，有汉族、满族、蒙族、还有日本人及朝鲜人，在新国家统治下，所有民族都要协力同心，和平相处，所以叫做协和会。”石原听到这理，不禁拍手叫好。于冲汉在枕头上摇摇头说道：“满洲国汉人最多，在新国家来说，各民族最优越的是日本人，其次是朝鲜人，再其次是满洲人，第四位才是汉人，汉人一定不服，但‘协和’二字，也能在中国古籍书经上找出典来，书经上有‘协和万邦’之说，以后可以根据经典作为宣传，叫汉人应遵照圣贤的旨意，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不要分出彼此来”。石原听后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心中无限佩服。于冲汉气喘吁吁又说道：“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协和’两字暗涵着协助‘大和

民族’，统一世界，将来日军不论征服什么地方，都可以要当地民众组织‘协和会’”。石原听到最后，简直高兴地跳起来了，再看着于冲汉，已经双目紧闭，面如金纸，显见得因话说得太多，已经累得昏迷了。

石原赶快跑回关东军司令部，找到片仓及几个中国亲日份子合拟了一个“协和会组织大纲”，送到本庄司令官处，本庄对于石原所主管业务，向来不加干涉，马上就批准了。从此“协和会”就在东北成立了。

协和会也有会纲，第一章“会之构成”。第一条“根本精神”，其中特别提到：最后目标为民族协和运动，推行于混沌状态中之中国本土上，扩充至全亚洲。这一段文字就是根据于冲汉的构想。不过，协和会成立之后，和于冲汉最初的设计也略有不同。于冲汉最初设计的协和会，只是一个民间团体，作为团结各族人民之用。到了组成之后，因为编制太大，会长由满洲国国务总理担任，最高顾问由关东军司令官担任，另设一名专任副会长，由日人担任，所以协和会的性质一变成为满洲国御用政党。当时曾有人主张改名为“协和党”，只因石原坚决主张用原名，所以未改。后来又规定协和会每年举行一次“全国联合协议会”，听取政府报告，应向政府提供意见，这一来又变成了议会，再过了一个时期，日方又命令满洲国各级政府官员与各级协和会人员交流，互相调换工作，到这时协和会又成为正式的政府机构了。所以要给协和会下一个定义，说清楚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可真不太容易。

协和会组织十分庞大，除去中央组织之外，有各省本部，置部长一人，由省长兼任，县（市）设县（市）本部，由县（市）长兼任，县以下的所有街、村皆设有“协和分会”，

下辖若干个班，班设班长，再下则为会员。协和会的会员发展很快，第一年就有130多万人，分会有3500多所。

加入协和会也并不十分简单，要经过会员介绍，还要宣誓才准加入，可是会员还是吸收了这么多。其中日本人就占了十分之一，朝鲜人占百分之五，俄系会员也有3500多人，真可谓包罗万象。

协和会经费的来源，大体有三种：一是会员交会费，二是国库补助金，三是事业收益费。其中最大收入，还是以国库补助金占多数。

协和会的范围后来更形扩大，其附属机构有“协和义勇奉公队”，征集20多岁至30多岁的男子，施以军事训练，并灌输“协和义勇精神”，平时维持治安，保护铁道，护林防火，战时就做为后备军，随时准备征名入伍；日本军方也知道成年人的思想不易改变，就进一步向青年及儿童下手，又成立了“协和青少年团”，13岁到19岁的男孩编为“协和青少年团”，此组织有一特点，就是只收男子不要女子，大概是导因于日本国内重男轻女的观念。因为有政治力量作后盾，协和会的各项组织发展得很快，成立不到一年，协和义勇奉公队已有20多万会员，协和青年团有35万多会员，分为1300多个团，少年团有1500多个团，人数有40多万人。

另外，各地又施行短期训练，征调青年在工作余暇，训练其王道思想——“东洋道德”。再高一级的有“协和会中央训练所”，训练各级协和会负责人。还有一所“协和学院”，负责训练协和会的未来干部，毕业后派往各地服务。

总之，在满洲国十四年中，协和会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时看起来，真象煞有介事，但是日军一朝战败，协和会也就烟消云散了。

（三）于冲汉其人其事：

说起于冲汉其人，满洲国倒真该赠他一个“元勋”的头衔，所谓“功臣”与罪魁兼于一身。

此人是辽宁省辽阳县人，过去留学日本，卒业后并未回国，转到东京外国语学校当中国语讲师。从那时起，奠定了他和日本人密切关系的基础，也就在那时，加入了日本秘密团体“黑龙会”组织。黑龙会是一个狂热的右翼组织，首领头山满和中国要人都有深交（和孙中山先生也有交往），他自己宣称是提倡大亚细亚主义，所以，这个组织亚洲各地人物都有，一旦加入，就要服从黑龙会的组织，为日本服务。根据头山满的解释，要想亚洲国家全部得到独立，必须日本强大，所以要把日本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观念就是以国际主义为名，而以侵略为实。

于冲汉加入黑龙会以后，颇得头山满赏识，日俄战争时，奉派去东北作间谍。当时战争在中国境内，俄军对中国人无法隔绝，于冲汉化装成一个小贩，在北满各重要城市跑单帮，负责调查俄国部队人数和军事配备，颇有成绩。日本战胜后，论功行赏，于冲汉也得到一张奖状和3千日元的奖金。

袁世凯称帝前后，日本人提出21个条件，想进一步并吞东北三省。当时张作霖任27师师长，奉天军务帮办，日本人早已看出张作霖必有远大前途，于是就派于冲汉回国，投奔张作霖。

以后，张作霖事业日渐扩展，担任东北三省巡阅使，掌管东北三省军政大权，财政方面倚重王永江，内政交给于冲汉。张作霖为人忠厚，用人推心置腹，他用杨宇霆、王永江都是把大权全部付托，决不从中掣肘。但是，他对人的观察确十

分精细。于冲汉最初也颇得信任，和王永江地位相伯仲，后来张作霖看出他替日本人卖力，就把他的职务免去了。

于冲汉被免之后，无事可做，不敢进关，又无面目回日本，一时，生活都成了问题。后来，还是头山满设法安置他在鞍山铁矿公司任总经理。这家公司按照规定是由中、日合办，但是大权全操于日本人之手。日本方面所以要于冲汉出任，不仅为了酬谢他过去对日本的贡献，并且还希望他将来再能有所作为。于冲汉从此恨张作霖父子，发誓有生之日一定要把张氏父子赶出东北。

于冲汉在鞍山铁矿公司任职时，究竟替日本人作了些什么额外工作，现在已无从查考。“九·一八”事变发生，于冲汉因病正在家里疗养，辽阳和沈阳是邻县，火车来往，声息相通，于冲汉听说日本军队占领北大营的消息，病体顿时好了一半，就要去沈阳报效，家人再三劝阻，才算留了下来。又过了几天，日本果然派人来请他了，家人眼见于冲汉病骨支离，精神黯淡，知道他生命不会太久，便苦苦劝他不要去“跳火坑”。于冲汉冷笑道：“你们知道什么？我就是因为身体不佳，在世不可能太久了，所以才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留名后世。”全家人都被他说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他怎样留名后事。于冲汉又说道：“留名不一定留好名，留芳遗臭，都是成名之道，岳飞固然不朽，秦桧何偿不也万载留名，宋朝宰相那么多，最深入人心的还是秦桧。我这一生留芳是没有希望了，能遗臭也是好的。”于冲汉打定了这个主意，家人也拦阻不了，由日本人备车接到沈阳，在关东军司令部第四科石原莞萧指导下，成立了“满洲国指导部”。满洲国成立之后，所有的典章制度都出于该部。日本人对于冲汉钦佩万分，但是满洲国的一批大员们，尤其是扈从溥仪到东

北的遗老们，都对于冲汉恨之入骨，因为他所拟的满洲国“制度”莫名其妙，非驴非马，除去国务院之外，什么参议院，立法院，监察院究竟做些什么事，谁都不懂，大概连于冲汉自己也觉得真是不通。当满洲国正式成立时，日本方面有意要于冲汉出任监察院院长，于冲汉坚辞不就，才换了罗振玉。罗振玉也迟迟不肯就任，过了几年，监察院和立法院都无疾而终，自动结束。

前面已经说过，于冲汉领导“满洲自治指导部”时，已经久病之身，到职后工作十分辛劳，又要兼顾日本军方各派系意见，折衷其间，尤其不易。到了满洲国正式成立，于冲汉已经病倒，住进了满铁附设医院了。首先去探病的石原同片仓，两人看见于冲汉的病已入膏肓，没有痊愈希望，也觉得黯然。于冲汉拉着石原的手，喘吁吁的说道：“石原先生，我受贵国厚恩，愧无以报，这次拟出满洲国蓝图，总算少报大德于万一，不过仍未能按照我的计划去做，将来必然还有麻烦，尤其是我未能在有生之日看到日满合并，真是死不瞑目。”

石原说道：“于先生，你好好养病，不要思虑太多，日满总有一天会合并的，你放心。”

于冲汉叹口气说：“石原先生，我要死了，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不知你能不能替我办到？”

石原拍胸说：“于先生，你只管说，我能办到的事决不推辞。”

于冲汉说道：“我活着未作日本人，自认是恨事，死后希望日本天皇能封我一个开疆拓土功臣封号，以光泉壤，我就心满意足了。”

石原满口答应，再看于冲汉头一低眼一闭，两手放松，

人已经断气了。

于冲汉就是这么个人，一心一意想做日本人的标准汉奸，此次去伪皇宫观光时，也曾见过于冲汉之大名在布告上出现。

（四）伪满洲国的国旗、国歌和国民训

伪满洲国的国旗也是由于冲汉所设计，只不过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加以变化一下而已。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是红、黄、兰、白、黑五色平行，上下并列，各色宽度相等，不分轩轻，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而伪满洲国之国旗则是：红、兰、白、黑、满地黄，红兰白黑四色上下平行并列于左上角，占整个旗面的四分之一，黄色则占全旗面的四分之三，是表示汉、满、蒙、回、鲜五族协和之意。

伪满洲国国歌则有两个，旧国歌是开国初颁订的，不知何人作词作曲。其歌词云：

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只有亲爱，并无怨仇。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义，尚礼让，使我身修。家已齐，国已治，此外何求。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

新国歌是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颁布的，其歌词云：

神光开宇宙，表里山河壮皇猷，帝德之隆，巍巍荡荡莫与俦。永受天祐兮，万寿无疆薄海讴。仰赞天业兮，辉煌日月侔。

以上两首歌，笔者均能唱完，可以朗朗上口，原谱已无法找到，仅能凭记忆用简谱记下。

关于国民训，日本人在东北实行奴化教育，加强思想控

制，强令人民平日背诵国民训，每日朝会时由一人领头，念一句大家跟着复诵一句，大声朗诵，声势壮大。早期念汉文，到了后期一律改用日文朗诵，其全文本已早就忘得一干二净。这次返乡去长春伪皇宫中游览时，在文史资料展览中，豁然发现有“国民训”展出，而且汉文、日文全有，于是当时就把全文抄下来。

汉文：

一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于皇帝陛下。

一国民须以忠孝仁义为本，民族协和，努力于道义国家之完成。

一国民尚勤劳，广公益，邻保相亲，精励职务，贡献于国运之隆昌。

一国民须刚毅自立，尊节义，重廉耻，以礼让为先，企图国风之显扬。

一国民须举总力，实现建国理想，迈进于大东亚共荣之达成。

1989年撰写

注：本篇撰稿人原籍即扶余人，现在台湾台北市。

扶余县日伪统治机构 及其罪恶活动

廖 国 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长期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了庞大的日伪统治机构。1931年末，日伪统治机构的魔爪伸向扶余，成立了扶余县公署（即县级政府），内设总务、内务、警务、动员、产业、地政、财务、经济、教育、防疫等11个职能科室，先后有452人在这些机构中任职。其中：历任县长6人；副县长9人；科长40人；股长37人；属官49人；吏员、雇员等311人。

为了加强地方统治，在政权体制上全面实行了保甲制。全县在原有8个保甲的基础上，又划分了扶余、八家子、伯都、大洼、发德、长春岭、伊家店、九间、蒋家、三井子、万发、增盛、新站、五家站、榆树沟、大三家子、三岔河、新城局、陶赖昭、蔡家沟、弓棚子等20个街、村，均设立了街、村公所（相当于现乡政府），共有692人先后在这些机构中任职。为了补充其政权力量的不足，强化统治，又增设了县协和会本部，并在各地设立了22个协和分会，共有成员300余人。

在所有的日伪统治机构中，警察、特务组织最为庞大。县警务科分别在扶余、蒋家、大洼、长春岭、五家站、陶赖昭、三岔河设立了警察署，并在全县街、村设立了警察分驻所和派出所，常设编制300余人。在这些机构中先后任职的警尉、警尉补、警长、警士等共有801人。

为了加强对人民群众反满抗日活动的侦察与镇压，县警务科还专门设立了特务股，各基层警察署也增设了特务系，除有一大批专职特务人员外，还豢养了很多密侦分子，共有特务人员189人，密侦人员120人。

除了常设机构，日伪统治阶级还根据每一时期的不同情况，相应增设一些临时性的统治机构，以辅助专门统治机构镇压人民群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五家站、陶赖昭一带群众曾发动一次抗粮抗捐的反满抗日斗争。为了更大规模地点燃这里的抗日烽火，及时引导群众向敌人展开斗争，中共哈尔滨特委迅速在陶赖昭秘密建立了特别支部。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该支部在日伪陶赖昭警察分驻所的12名警察中秘密发展了8名共产党员，并在当地铁路、邮电工人中发展了一些党员，逐步展开了地下抗日活动。后来，党内出现叛徒，特支遭到了严重破坏。从此，日本侵略者对陶赖昭一带非常重视，将陶赖昭划分为防共的重点地区，因而不断增加附设统治机构。1933年在陶赖昭设立了日本领事馆，并在三岔河设立了分馆。领事馆内设特务部，配有专职人员。在三岔河，还设立了日本宪兵分遣队、日本守备队森垣中队等武装组织。1934年，又在扶余县城增设了日本领事馆，并派驻了日本宪兵队和伪军田春部队（一个团）。

1940年以后，日伪统治者把扶余县确定为保卫伪满

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第二道防线。当时，扶余是吉林省与滨江省、吉东省三省交界的战略要地，同时，又与抗联活动一度频繁的“三肇”（即今黑龙江省肇源、肇州、肇东三县）地区毗邻，常有抗联队伍在扶余北部沿江一带出没，因而，日伪统治者对扶余大大增加了戒备和防范。他们一面加强常设统治机构的力量配备，一面从外地大批调入特务和武装部队。1940年3月“三肇”事件后，日伪吉林省警务厅厅长兼地方保安局局长井村矢之柱亲自到扶余视察督导防务工作，并调来30余名特务，组成吉林省警务厅西北地区特别搜查班，到长春岭一带侦察江北肇源方面抗联活动情况。伪满洲国中央警务司属官、汉奸于飞龙和滨江省特谍班长、日本特务厚腾令志，纠集家里教头子冯静猷、匪首韩福元等10多名反动头面人物，组成“野夫工作班”，也4次窜入扶余搞所谓“收降土匪”等活动。不久后，又在扶余北部沿江地区建立了“平术讨伐队”、“潘锡铭讨伐队”、“鸡头山讨伐队”“田广部队”等地方反动武装组织。1942年7月，图们日本宪兵队还在扶余建立了“关东军委嘱宣抚部扶余工作班”和“陶赖昭宣抚班”两个特务外围组织。

日伪统治集团利用上述统治机构和特务、武装组织，在对统治扶余长达14年的过程中，先后制造了“高家粉房惨案”、“三岔河老城墙惨案”、“血洗大獐子洞”等5起骇人听闻的重大流血事件。1936年12月，日军首席指导官石尚，纠集宪兵队、领事馆、县警务科特务股和司法股的军、警、特人员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捕，共捕“政治犯”、“经济犯”等500余人，其中有70余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3人被枪杀。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在历次惨案中直接死于日伪统治者屠刀和枪弹之下的无辜群众，

有据可查的就有140人，足见日伪统治阶级的法西斯暴行是何等的残酷和野蛮！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扶余的日伪统治机构宣告土崩瓦解，额首称庆的扶余人民从此摆脱了民族压迫和剥削，开始了新的生活。

1991年根据文献资料整理。